

DAOHANG ZHONGGUO

DISANDAI ZHONGYANG LINGDAO JITI DE JUECE LICHENG

武国友◎著

导航中国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历程

2

福建人民出版社

D61/117

2007

DAOHANG ZHONGGUO

DISANDAI ZHONGYANG LINGDAO JI SHI DE JUECE LICHENG

武国友◎著

导航中国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历程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导航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历程/武国友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5

ISBN 978-7-211-05456-5

I. 导... II. 武... III. 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7600 号

导航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历程

DAOHANG ZHONGGUO; DISANDAI ZHONGYANG LINGDAO JITI DE JUECE LICHENG

著 者：武国友

责任编辑：李天兵

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印 刷：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350003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37

字 数：657 千字

版 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 978-7-211-05465-5

定 价：5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言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接过了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冷静观察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沉着应对复杂局势，紧紧依靠党内外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中共十六大的十三年，是中国以磅礴之势推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十三年，全世界都为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而感叹。在这十三年里，中国共产党先后举行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以开启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而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1992 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深刻阐述了一系列长期困扰人们的重大理论问题，又一次推进了思想大解放，具有划时代意义。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巨大勇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以此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逝世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继党的十四大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一历史性抉择之后，党的十五大又进而明确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并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重大理论突破，在世纪之交的重大历史关头，为把社会主义的中国

胜利推向 21 世纪，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

十三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依据，通过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立于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潮头，把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对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摆在观察世界发展的突出位置，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突出位置，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鲜明的时代精神，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站在观察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度，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重大课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这些重大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十三年来，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统一，目标明确，从容应对关系我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排除各种干扰，经受住了种种考验，战胜了一系列来自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的风险和挑战，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不断研究和解决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研究解决那些关系经济建设和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以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努力探寻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途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关系的正确处理，从而才使我国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获得了协调发展。这十三年，我们走过的道路虽然很不平坦，但是却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 1989 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 9.3%，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人们公认，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一个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一个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一个时期。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做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

鉴于这段历史距今甚近，有些问题尚待必要的历史积淀。该书唯求平实、

客观，以叙述改革和发展的来龙去脉为主。对发展中的问题尽可能如实反映，客观分析，不事标新立异、刻意追赶前沿，这一点是可取的。当然，作为一部史学性著作，不断跟踪学术前沿，广纳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丰厚其积累也是不可少的。希望作者在这部著作已有较好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认识，拓宽领域，加强研究，以期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准。

石仲泉

2006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交接	1
★ 面对全球大剧变的冲击	1
★ 改革面临“过大关”	12
★ 应对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	20
★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担起党和国家的重任	26
★ 打破西方“制裁”	37
第二章 开创改革开放新阶段	48
★ 搏击思想“困围”	48
★ 震撼人心的南方谈话	53
★ 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67
★ 中共十四大及其三大决策	74
第三章 疏导经济“大潮”	82
★ 住房制度改革引发房地产热	82
★ 完善承包制，试行股份制	91
★ 理顺价格和流通	107
★ 努力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114
★ 全方位宽领域对外开放	121
第四章 与市场经济接轨	137
★ “治乱”与“治热”	137
★ 建构新的财税体制	150
★ 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制改革	157
★ 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167
第五章 跨世纪的战略构想	177
★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77
★ 创新、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3
★ 规划社会发展远景	205

★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213
★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220
第六章 面向新世纪的战略部署	235
★ 世纪末的路向抉择	235
★ 中共十五大：跨世纪的战略部署	240
★ 大刀阔斧地进行政府机构改革	251
★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261
★ 扩大内需再造经济活力	283
第七章 结构调整的新突破	301
★ 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改造	301
★ 全面启动再就业工程	322
★ 增强“三农”发展后劲	338
第八章 全面改革，加快制度创新	365
★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365
★ 推进军队和国防体制改革	383
★ 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400
★ 贯彻以德治国方略	417
第九章 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427
★ 香港回归祖国	427
★ 澳门回归祖国	451
★ 海峡两岸关系的曲折发展	461
第十章 构筑面向新世纪的外交关系新格局	486
★ 拓展多边外交，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486
★ 中俄关系的良好发展	494
★ 中美关系的风雨历程	506
★ 多渠道外交战略的展开	522
第十一章 执政党建设的新探索	532
★ 确立跨世纪的党建新目标	532
★ 党的建设工作的全面加强	537
★ 加强廉政建设，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552
★ 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	558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贯彻	565
结束语 中共十六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576

第一章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交接

★ 面对全球大剧变的冲击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整个世界大势呈现出一道奇异的景观：苏联——一个号称超级大国的“北极熊”破败了，给人们留下记忆的是一个具有 70 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解体。与其同病相怜的是，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改辙易帜。究其根源，虽有原因种种，但关键在于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没有搞好。与此相反，在亚洲，有几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国家和地区却在迅速崛起，人们称之为“小龙”、“小虎”。它们之所以会令世人刮目相看，原因也就在于经济的迅速发展给它们带来了良好的声誉。面对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大剧变，从中应该汲取什么？怎样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潮流而又不重蹈别人的覆辙，并在未来的发展中争取主动？对此，刚刚担当起党和国家领导重任的第三代中央领导人在思考，已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在思考。

苏东剧变的启示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有的两极世界格局被打破，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种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既提供了发展的良好机遇，也带来了压力和挑战。怎

样才能在新格局中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使中国在多极世界里迅速崛起，这是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现实课题。

如果将中国放在世界的大格局中作横向比较，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历史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或许，只有透过这个视角，人们才更能理解邓小平的一片苦心。提到“契机”这个人们望眼欲穿的字眼，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左”的干扰，它曾几度从我们身边溜走。

第一次机遇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时正值世界性的科技革命的兴起，面对这次机遇，德国、日本抓住了机会，因而使本国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而我们由于这时正在搞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正在大搞阶级斗争，错过了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这样，我们不仅被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拉下，而且被发达国家甩得更远。

第二次机遇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一时期，正值发达国家进行技术的更新换代。对于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正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好机会，而这时我们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再次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相反，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却抓住了这次机遇，因而经济迅速腾飞，实现了现代化。

正因为错过了这两次机会，所以我们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才迅速拉大。

回眸历史，人们不难记起，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与日本相比，经济还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落在了人家的后面。

更为冷酷的现实是，由于未能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从1989年6月波兰大选开始，东欧风云突变，到年底出现了“多米诺效应”。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四国共产党的权力基础遭到严重破坏；12月，罗马尼亚事件后，罗共已不复存在。半年之内形势变化如此之快、之大，为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们始料不及。1990年上半年，东欧各国共产党队伍又遭到了极大的削弱，经过大选或地方选举，绝大多数丧失了政权，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之后，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情况也急剧变化，共产党失去政权沦为在野党。1991年，苏联“八一九”事件^①后，

^① 1991年8月14日，苏联公布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条约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这一条约的签订，不仅意味着苏联国家体制将面临重大变化，而且意味着苏联瓦解的开始。在苏联行将毁灭的时候，一些试图维护苏联本来的联盟体制、避免苏联解体的苏联高级官员于8月19日发动事变。这是在悬崖边上挽救苏联的最后一次尝试，但为期3天即告失败。“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及其支持者迅速掌握了国家大权。“八一九”事件的悲剧性在于：它以维护苏联为初衷，却成了加速苏联瓦解的催化剂。

苏联共产党受到沉重打击，政治上丧失政权，组织上陷于瘫痪，其活动也无法正常进行。就整个东欧共产党国家来说，都发生了剧变。苏联解体分裂成 15 个国家，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即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波黑共和国及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即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

1991 年 12 月 25 日，西方正在庆祝圣诞节之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却发生了一次举世关注的大事件：飘扬了 69 个春秋的苏联国旗降落下来。这意味着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给自己画上了一个难圆的句号。

昔日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顷刻之间在剧烈的事变中瓦解沉没了，既无坦克声也无硝烟味，这是为什么？对此，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在焦灼地思索。毋庸讳言，对于这样一个广泛而又复杂的世界性问题，要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绝非易事，但有一点却使人们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不改革、不加快发展是没有出路的。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不断地报道苏东剧变后的状态：共产党权力被剥夺，共产党领导人纷纷落难，共产党财产被没收，原官员和秘密警察受迫害；经济呈滑坡趋势，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民族矛盾尖锐激化，民族冲突战火连天，国家解体，等等。

当然，也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总结苏东剧变，认为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直接结果；有人认为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执政党，没有一个保持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央领导核心，在关键时刻，领导层的分歧导致了党的分裂，给反对派夺权提供了机会；党的主要领导人独断专行，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致使在重大政策上一再失误；当要求民主的浪潮袭来时，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错误地接受了政治多元化理论，使各种思潮纷纷出笼，反对派组织和政党林立，走多党制议会民主道路成为一股洪流，最终冲垮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党内缺乏健全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主要是没有实际地体现全党对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监督机制，等等。诚然，上述因素对于苏东剧变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人们更应该看到，苏东剧变最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经济基础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没搞好，体制有问题，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失去了吸引力，引起这些国家人民群众甚至是广大党员的强烈不满。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悲剧，典型地呈现出这样的冲突性社会状态。

就苏联的情况而言，它的经济体制从 20 世纪 30 年代建立之后直至解体，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其理论基础是产品经济论，即极端排斥市场调节，视商品经济为异己。其运行机制则依靠权力的指令来构建。经济结构是准军事型的超重结构。不可否认，苏联经济体制在其存在的几十年时间里，起过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使苏联从沙俄时代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几十年当中跻身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行列。从这方面讲，功不可没。然而，这一切都是在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缺乏平衡和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缺乏创新力，阻碍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一旦权力和指令的结构发生震动，经济体制的运转便会发生震荡，导致原本已经功能衰竭的经济体制失去生存能力。

经济失败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苏联经济体制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效率低下，激励减弱，运行失灵。从苏联经济发展的一些效率指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由 1951 年至 1955 年的 11.4% 下降为 1966 年至 1970 年的 7.7%，即降低了 1/3。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在各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均实际增长率的情况是：社会总产值，1966 年至 1970 年为 7.4%，1971 年至 1975 年为 6.3%，1976 年至 1980 年为 4.2%，1981 年至 1985 年为 3.3%，到 1990 年降至 -2%；国民收入，1966 年至 1970 年为 7.8%，1971 年至 1975 年为 5.7%，1976 年至 1980 年为 4.3%，1981 年至 1985 年为 3.2%，到 1990 年又降至 4%。再从投资效益和基金产值率来看，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产出的国民收入，由 1960 年的 72 戈比，降为 1970 年的 54 戈比，1980 年又降至 40 戈比，到 1984 年只有 38 戈比。苏联的基金产值率，在 24 年里几乎降低了一半。

这种僵硬、效益低下的体制，导致苏联的经济危机最终由慢性发展变成急性发作。所以，原体制的一切教义都走向其反面：从产品经济观滑到市场拜物教，从指令性经济走到无政府状态，从党包揽一切经济决策走到解散共产党。

在苏联解体的问题上，军备竞赛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军备竞赛导致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是军备竞赛导致经济结构的畸形。

苏联的经济实力远逊于美国，但军费开支却稍高于美国。仅此一点，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的损害程度便可想而知了。过去苏联发表的官方统计数字，显然夸大了苏联的经济实力。按苏联国家统计局的计算，1987 年，苏联国家收入总额相当于美国的 64%，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 57%。但是按《美国统计摘要》计算，1987 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相当于美国的

54.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46.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1987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美国的39.6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4.66%。此外，其工业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9%。在这种状态下，苏联拼命地维持军事上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均势，其霸权地位完全是靠拼性命的结果，因而不可能长久。1991年5月，俄罗斯共产党一位领导人曾透露，苏联40%的生产能力，都用在了军事生产上。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非垮台不可。

再从体制设计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来看，苏联的旧经济体制是传统工业化时期产品经济模式的产物。从理论上，它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这种构想主要表现在关于商品货币关系消亡的设想，作为体制设计的现实指导，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排斥商品和货币的。可回到现实中来，苏联当时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商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任务重，时间紧，用通常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商业轨道，不能保证经济生活的运行。此外，就当时苏联工业化建设的主导思想而言，是出于政治考虑保卫苏维埃，而不是充分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尽管重工业大都亏损，而斯大林则誉之为资本主义经济无可比拟的“高级赢利”。这与产品经济理论恰好合拍，从而强化了产品经济观。它不仅表现在流通和交换领域，也渗入社会经济的深层结构。从限制市场和价值规律作用，到否认经济利益差别，忽视物质利益原则，乃至高度集权，行政指令等，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无不体现产品经济的精神。

这种产品经济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曾起到特定的作用。但是，它有着巨大的历史局限性，既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又不能合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经济利益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劳动者实际拥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及其产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产品经济扭曲了这些关系，因而没有生命力。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把这种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经济体制固定化、神圣化了，不认为它需要不断地加以改革。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绷紧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导致突变。从苏东剧变的经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得好：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这种总结，可以说是对苏东剧变血的教训的深刻反思。

苏东剧变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这一点应该值得我们注意。而周边国家的迅速崛起，已经对我们形成了压力和挑战，这也是我们不得不直面以对的

严峻现实。

来自周边的压力与挑战

打开世界经济发展级差图，人们就会从这种曲线变化中清楚地看到，中国周边那些曾被中国人认为是不太发达的昔日“蛮夷小邦”，如今已把中国抛在了后边。

20世纪80年代，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被称作“四小龙”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发展，远远超过了我们。

台湾省1952年至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平均8.4%的速度增长，1988年以来年平均为7.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52年为194美元，1991年达到8815美元；“进出口贸易”1950年至1975年间，只有3年为顺差，而1976年至90年代初，每年都是顺差；1991年，“外贸”总额达到1391亿美元，高于祖国大陆的1357亿美元；1985年仍有外债47.65亿美元，1988年以后，已没有外债负担，而到1991年底，外汇储备已达824亿美元。台湾省经济的较快发展固然有着重要外因，但其不断进行调整的内因也不可忽视。

1949年至1952年，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业有了较快发展。1953年至1960年，采取“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政策，鼓励和保护创办替代工业，使工业产值明显上升。1961年至1973年，由“进口替代”政策转向实行“出口导向”政策，重点发展纺织、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吸引外商投资，设立出口加工区，引进技术设备，大力开发新产品，积极鼓励出口，使工业产品出口大大增加。

1974年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朝着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的经济方向发展，加上工资成本上升，主要的出口市场——美国的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加强，使出口面临一定困难，台湾对此转而采取“分散出口”政策，并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实现工业升级，保证经济持续发展。

香港1945年至1950年，主要恢复和发展转口贸易和有关服务业，194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418港元。1951年至1960年，经济由转口贸易为主转向以发展轻纺工业为主，其产品以外销为目的。1961年至1970年，大力发展制造业。从70年代初开始，工业向多元化、高质化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经济进入国际化新阶段，成为区域性的金融、航运、贸易、旅游、信息中心。199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6000美元。

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了发展教育这一不同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

策，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60年代初，又采取“出口主导型开发战略”，利用外国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发展出口加工业，同时对纺织、食品等工业进行投资建设。从70年代初开始，实施发展重化工业方针，并大量吸收国外直接投资，推行新技术产业化道路，加强对海外投资，保持了经济发展势头。1971年至1991年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6%~11.3%之间。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

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幅员很小，地质情况复杂，自然资源贫乏，连淡水都要进口的岛国。但就是这样的环境，新加坡却取得了世界公认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显著成果。这是新加坡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政策的结果。新加坡1959年独立后，实行开放型的经济政策，进出口货物基本免税，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不加干预，只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对外贸易，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并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进而促进了工业化的完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注重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高科技工业发展。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971年至1980年为9%，1991年为7.7%。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0450美元。新加坡在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加坡政府重视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通过学校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经过长期努力，他们把自己小小的岛国建成了具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美丽、清新、整洁、舒适的自然环境，从而形成了对世界各地游客极具吸引力的“花园国家”。

在中国周边，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正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传递的有利时机，利用较之以往宽松得多的国际自由贸易环境，取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据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6%，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率为7.5%。8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8%，东亚地区为8%。90年代按标准估算模式预测，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8%，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率为7.7%，其中，亚洲“四小龙”为7.2%，东盟四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为6.2%，中国（不含台湾、香港、澳门）为9.1%，增长率均比世界经济增长平均高5个百分点左右。^①由于经济增长较快，所以贸易中心开始向这一地区转移。80年代末90年代初，亚太地区对外贸易额已占

^① 中国市场经济全书编委会编：《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全书》，第1卷，第24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世界总贸易额的 1/4，外汇储备占到世界的 1/3。1980 年，在世界最大的 20 个出口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只有 4 个，1991 年已达 9 个。美国 1992 年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值达到 2190 亿美元，约占美国出口总额的 49%；在进口总值中来自亚太地区的进口值为 3130 亿美元，约占美国进口总值的 57%。面对亚太地区这种迅猛的发展势头，一些未来学家曾作出这样的估算：因地理、人口、经济环境和购买力等因素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地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按经济势力划分，大体上呈宝塔形。位于塔尖的是日本；第二层的有亚洲“四小龙”；第三层是东盟四国；第四层是南亚诸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和阿富汗；第五层就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了。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既是刺激和挑战，也是示范和机缘。争雄经济霸主的日本与强势推进的亚洲“四小龙”都在经济发展中显示出咄咄逼人之势。台湾《天下》杂志 1988 年 7 月 1 日刊登了一篇分析 1967 年至 1986 年 20 年来世界十大国（美国、日本、苏联、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中国、加拿大、巴西）在全球生产总额中所占的地位变化的文章。文章指出，西方各大国除联邦德国、意大利地位略有上升外，其余各国均已下降，其中美国衰退尤为严重，虽仍为第一强国，但比重却由占世界生产总额 33.8% 降至 26.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日本却从 5.2% 猛增为 12.4%，由 20 年前的世界第三取代了苏联而成为今日世界经济亚军。亚洲“四小龙”虽未进入十强，但近 20 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却平均以近 10% 的速度增长，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佼佼者，其增长速度之快，不但远远超过美国、西欧，甚至连日本也望尘莫及。文章结论是：国力竞赛，东升西落。事实的确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 年代产生了联邦德国奇迹，60 年代崛起了日本，70 年代亚洲“四小龙”实现腾飞。进入 80 年代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也让世人刮目相看。一个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正初现轮廓，开始同北美和欧洲共同体经济集团分庭抗礼。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 100 美元，1988 年已是 21050 美元，仅次于瑞士；60 年代初开始经济起飞时，中国台湾、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 100 美元左右和 83 美元，1988 年中国台湾已超过 7000 美元，韩国亦有 3600 多美元，中国香港、新加坡已达 8000 多美元。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水平超过欧洲的西班牙、希腊、爱尔兰。

1988 年，日本出口额达 2647 亿美元；面积和人口都只与中国浙江省差不

多的韩国，出口额达 600 多亿美元，大大超过中国出口总额；面积比海南岛大不了许多的中国台湾省，出口额也在 600 亿美元以上。东亚地区出口的商品已远非 20 世纪 50 年代的初级农矿产品、六七十年代的轻纺工业品，它的产品构成、市场分布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产品早已充斥美国市场，令“山姆大叔”徒唤奈何。韩国也已向另一超级经济强国——德国市场发起了挑战。

当世界首富的美国正日趋蜕变为世界最大债务国时，日本却成了最大资本输出国。当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工业国被沉重的债务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中国台湾却有 800 亿美元的盈余正愁找不到出路，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韩国虽债台高筑，但由于其年出口额增长快，外汇收入高，因而没有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债务危机。

经济发展伴随着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的转换。东亚不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基本上都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然而，此时的东亚地区早已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换。从三次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及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来看，日本现在已是服务主导型的后工业经济。中国台湾、韩国则早已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中国香港、新加坡基本上没有农业，乃城邦经济，也从以前单一的转口贸易经济过渡到以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亚地区只有东京算得上国际大都会。香港、新加坡、台北、汉城尚名不见经传，而今均跻身于国际金融、贸易、信息、运输、商品集散中心之列。

如今，东亚地区经济正拟更上一层楼，日本雄心勃勃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1989 年美国取消了以往给亚洲“四小龙”贸易普惠制待遇。这意味着“四小龙”已从新兴工业化经济行列中毕业，向成熟型的工业化经济迈进。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逐步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

面对世界经济中心悄悄东移的态势，国际上许多人士纷纷预言：21 世纪亚太地区将取代北大西洋两岸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21 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马克思 1848 年曾赞叹过 18、19 世纪工业革命的完成，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二次大战后不到半个世纪内，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地区获得的经济成就及速度又远远超过了欧洲工业革命时期。

近来，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正在崛起的亚洲“第五条龙”泰国，以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某种特色，正在日益受到世界各